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鄧小平時期的中共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in Deng's China

doi:10.30390/ISC.199707_36(7).0003

問題與研究, 36(7), 1997

Issues & Studies, 36(7), 1997

作者/Author：許志嘉 (Chih-Chia Hsu)

頁數/Page：35-5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7_36\(7\).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7_36(7).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鄧小平時期的中共外交政策

許志嘉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透過對中共外交政策文件的重要宣示與外交政策實踐的分析，對鄧小平時期中共外交政策的內涵進行實證統計分析，發現此時期中共標榜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應可分為醞釀期（1979～1982）、發展期（1982～1985）及成熟期（1986～1996）等三個時期，透過不同階段的演化，中共於一九八六年正式提出具「鄧小平特色」的新時期外交政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從政治、經濟及軍事活動等層面的實證分析發現，中共外交政策的宣示與行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隨著外交政策的轉變，中共在對外的實際互動上確實出現一定程度的變化，適應不同時期的外交政策，中共在實踐上，也透過不同的方式推動外交政策，在發展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同時，對美國、俄羅斯、已開發國家、（原）共黨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展開各種層面的互動，藉以達到其走出不依賴大國的獨立政策，鞏固中共政權的穩定發展。

關鍵詞：中共外交、外交政策、獨立自主、中共、對外關係

* * *

壹、前言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共元老鄧小平病逝於北京，引起舉世注目，這位自稱為「普通共產黨員」的老人，過世時雖未帶有中共高層領導的頭銜，但他在統治十二億人口的中共政權的地位，確是一位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①這位一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的「總設計師」，在中共的政策路線上開創了有別於毛澤東時期的所謂「新時期」，他主導下的政策路線是否會隨著他的過世而「人亡政息」，出現轉變，是各界所關注的問題。在探討中共未來政策走向的同時，鄧小平時期的政策方針實質內涵為何，值得吾人作一個全面性的回顧與整理，作為進一步檢證中共未來政策走向的基礎。

註① Quansheng Zhao,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Micro-Macro Linkage Approa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55.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舉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被中共定性為「歷史的轉折點」，^②是次會議之後，鄧小平掌握中共高層決策主導權，中共在總體發展方向上，走向所謂「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③不過，這種轉折與新路線，最初與最主要的反應是表現在內部發展路線方面，外交政策的轉變並不是立即而明顯的，^④一直到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上，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才正式提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這項有別於毛澤東時期外交路線的政策，確立了鄧小平主政時期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外交政策採取「獨立自主」原則似乎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一九八二年中共高舉「獨立自主」旗幟，正顯示中共一九五〇、六〇及七〇年代所採行的「一邊倒」、「反美反蘇」、「一條線聯美反蘇」等外交政策，具有明顯的針對性與策略聯盟性質。而這個有別於過去中共外交政策明顯具有敵對陣營的路線方針，凸顯出鄧小平以強調提高生產力，追求經濟發展為主要任務，避免與其他國家為敵，採取具有鄧小平追求經濟發展特色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而此政策具有何種指標意義，其具體內涵為何，以及在實際行動上中共如何遂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都是值得吾人進一步分析探究的。

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內容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在外交政策上的演變，以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七年鄧小平過世之間，作為主要的探討範圍，利用文件分析方式，從中共黨與政府的重要文件及高層領導人的重要講話著手，分析中共宣示的外交政策內涵。同時，為了論證中共外交政策與實際運作實踐之間的關係，本文假設中共外交政策對中共的對外行動具有相當高的指導性，亦即中共的外交政策與外交行動具有一致性，在此假設前提下，本文將採用實證分析方法，從中共對外政治、經濟與軍事關係層面著手，分析中共與其他國家政治經濟層面互動的實際關係，藉以解析中共的外交行動是否與政策宣示內容相符。

貳、鄧小平時期中共外交政策演變

目前中共官方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外交政策統稱之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指此外交政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和國內任務的需要，對中共外交所進行的重大調整，「發展並豐富」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⑤此種「官方說法」，基本上強調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歷史上的重大轉折

註②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四八七。

註③ 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七四。

註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公報中明白表示，全黨工作要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時「全會討論了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認為黨和政府的對外政策是正觸的，成功的」，事實上就是肯定三中全會前既定的外交政策。參閱「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一。

註⑤ 田曾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

地位，並說明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已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外交政策的基調。

不過，從中共官方文件來看，事實上，中共目前所標榜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卻是在一九八六年中共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以後，才正式而統一地出現在官方的文件上，^⑥在此之前，中共的憲法與官方說法，是以「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詞來指稱中共外交政策，但「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說法的首次正式出現於中共官方文件也非源自十一屆三中全會，而是始自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⑦

從中共官方文件宣示來看，鄧小平時期中共外交政策經過一次重要的轉折，以及一次名稱及內涵上的確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並非如中共官方所宣稱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便採用的外交政策，如果不強調外交政策的實質內涵，而從中共以「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來概括整個鄧小平時期中共外交政策的官方觀點來加以分析，吾人可以將鄧小平時期的中共外交政策的發展區分為「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醞釀期」、「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發展期」及「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成熟期」等三個時期來加以說明。

一、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醞釀期（1979～1982）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時，中共外交政策基本上並未進行重大的調整，此次會議中共仍然肯定「黨和政府的對外政策是正確的」，認為發展「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為中共外交取得重要成就。

一九七九年六月，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上提出「政府工作報告」時對中共外交政策提出概括的說法，表示中共一貫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並遵循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論斷，要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同時要以「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與各國發展關係。^⑧文中表明，中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而「反對霸權主義」和「維護世界和平」則被視為中共對外工作中的兩面大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爭奪世界霸權促使戰爭危險成長，而「社會帝國主義」則是國際緊張局勢的主要根源。^⑨

註⑥ 一九八六年三月，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在中共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提出的「關於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報告」中，首次明確地以「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稱中共的外交政策，參閱趙紫陽，「關於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報告」，*匪情年報一九八七*（台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民國七十六年三月），頁六-七五。

註⑦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三九。

註⑧ 「華國鋒在偽『五屆人大』第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匪情年報一九七九*（台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民國六十八年）頁四-七二。

註⑨ 同前註，頁四-七一、四-七三。

一九八二年一月，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表示，「支援第三世界各國人民保衛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和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的正義鬥爭」，是中共不可推卸的國際義務。^⑩同年四月，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指出，中共制訂對外政策的基本依據，仍然是毛澤東提出的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中共的對外政策總方針則可概括為：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反對霸權主義與維護世界和平；他同時強調，中共既反蘇霸，也反美霸，中共對外政策是有原則的，獨立自主的。^⑪

從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到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以前，中共重要外交政策宣示文件中可發現，此時期中共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維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外交路線，雖然中共已強烈表示外交政策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不過，中共基本上仍未清楚地概括出一個具有鄧小平特色的外交政策，只是一方面強調過去外交政策的正確，同時也要求外交政策要配合內部的現代化建設。從官方文件宣示來看，中共仍然持續執行「一條線」外交路線，^⑫強調「三個世界」理論作為中共外交政策的理論根據，採取「反霸統一戰線」策略，以蘇聯為主要的威脅來源，持續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發展時期（1982～1985）

一九八二年九月，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十二大上提出名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中，指中共採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強調中共處理對外關係的根本出發點是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中共的對外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重申中共採行「和平共處五原則」發展對外關係，並表示革命決不能輸出。文中同時強調，威脅世界和平共處的主要力量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與殖民主義，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世界人民最主要的任務。^⑬

同年十二月，中共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序言中，也指出中共採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發展與各國關係，並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

註⑩ 胡耀邦，「關於對外經濟關係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頁一〇五五。

註⑪ 趙紫陽，「我國的對外政策和國內形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頁一一七七～一一七九。

註⑫ 所謂「一條線」外交，是指中共採行以蘇聯為象對象的「反霸統一戰線」戰略，與由日本經中東到西歐，及南邊自澳大利亞、紐西蘭到美國這一條線周圍的國家改善關係，以防止蘇聯可能的擴張侵略，危及中國大陸的安全。參閱田曾佩主編，前揭書，頁四～五；吳強，「中國的反霸統一戰線政策」，楊思正、俞冠敏主編，社會科學爭鳴大系（1949～1989）·世界經濟·國際關係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五二六～五二九。

註⑬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三九～四六。

主義、殖民主義，強調要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⑭

一九八四年五月，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在六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中共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維護世界和平是中共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反對霸權主義與維護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霸權主義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中共要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合作，並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其他國家發展關係。^⑮

同年五月，鄧小平對中共外交政策提出概括的說明，表示中共外交政策主要是兩句話，一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一是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並提出世界的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和平問題，一是南北問題，而中共對外政策的目標則是要爭取世界和平。^⑯

一九八二年中共召開十二大以後，開始以「獨立自主」一詞來界定其新時期的外交政策，這個時期中共已提出有別於「一條線」路線的外交政策，在文件宣示上已刻意減少凸顯蘇聯等同於霸權主義的說法，而同時把美蘇兩個超級強權統稱為霸權主義，顯示中共在兩超強之間的「獨立自主」立場；同時，這個時期中共也不再強調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逐步發展出「和平與發展」理論，開始強調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兩大問題，為中共追求和平國際環境與內部發展的有機連結，尋求合理化、合法化的理論依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之時，中共也開始強調要結合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把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概念予以統合運用，以配合必要時的政策宣傳。

三、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熟時期（1986～1996）

一九八六年三月，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在六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提出中共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報告時表示，為了使「七五」計畫順利實施，加快現代化建設，中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爭取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趙紫陽並提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內容和基本原則包括十個方面：(一)反霸、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與促進共同繁榮，是中共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二)世界各國一律平等，世界事務由各國協商解決，中國決不稱霸，也反對任何霸權；(三)堅持獨立自主，一切國際問題依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中共的態度；(四)中共決不依附任何一個超級強國，不與任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五)中共將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發展對外關係；(六)中共屬第三世界，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合作是中共對外工作的一個基本立足點，中共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七)中共反對軍備競賽；(八)中共堅持長期實行對外開放，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擴大與各國的經濟、貿易、技術交流與合作；

註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務部調查局編，中共現行法律彙編（台北：法務部調查局，民國七十八年），頁三。

註⑮ 趙紫陽，「政府工作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頁四九二～五〇二。

註⑯ 鄧小平，「維護世界和平，搞好國內建設」，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五六～五七。

(九)中共支持聯合國依據憲章精神所進行的各項工作；(十)中共重視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鼓勵民間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①

一九九七年二月鄧小平過世，同年三月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中強調，中共採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繼續在和平共處五原則基礎上發展對外關係，並將持續採行對外開放政策，進一步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係；他表示，世界形勢走向緩和，多極化格局進一步發展，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威脅著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經濟發展，仍是國際社會的主要任務。^②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時期，基本上是延續一九八二年以來的外交政策路線，只是中共經過若干年的摸索，終於在一九八六年為鄧小平時期的外交政策賦予確切的名稱與內涵，標誌著鄧小平時期中共外交政策達到成熟階段。此時期中共外交政策與前期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把「和平」一詞明定於官方說法上，以強調政策的屬性是和平性質的，同時，把中共外交政策作一總結整理，把籠統的「獨立自主」內容具體化，提出確切的內涵明白標示中共外交政策的具體意義，既使中共執行外交政策單位有明確目標，也使各國明白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確實內容。基本上，此時已把中共的外交政策內涵作出全面的說明，此後的政策宣示基本上並不出此範疇，所不同者是中共依據國內外形勢的轉變，而調整了部分內容指涉的範圍與重點。

一九八六年以來，中共外交政策基本上已完成戰略方向的布局，爾後的政策宣示並未出現轉折，即使是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隨後又出現東歐及蘇聯共黨政權的垮台等國內外重大事件，但在既定的方針下，並未影響中共外交政策內容，中共只是重申既定的外交政策。一直到一九九七年二月鄧小平過世，中共仍然強調堅持獨立自主外和平外交政策，政策基調已與中共倡議的改革開放、四個堅持等兩個基本點一樣，成為中共不變的政策。

叁、政治層面的分析

一、主要領導人出訪

在檢證一個國家外交政策政治面的實踐時，主要領導人出國訪問情形，時常是代表雙方關係是否密切的一項重要指標，國家間互動關係愈密切，彼此互訪的情況便會愈多，訪問的層級愈高，表示愈重視與該國的關係，不論是國與國之間有歧見待解決，或是要增進彼此之間的友好關係，主要領導人員的互訪是國家互動密切的一項極具象徵意義的行動，從中共主要領導人出訪國的情況統計，可以對中共與各國之間互動關係是否密切提供實證的數據說明。

在「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與「和平與發展」論調尚未明白揭示前，中共外交文件

註① 趙紫陽，「關於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報告」，前引文，頁六-七五~六-七七。

註② 李鵬，「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六日，版二。

仍強調「三個世界」理論，作為中共外交政策指導原則的地位，在毛澤東對三個世界的劃分中，美國與蘇聯屬於第一世界，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及加拿大屬第二世界，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屬第三世界。^①中共「三個世界」劃分與一般國際關係學界的劃分並不相同，一般國際關係學者稱工業化國家為第一世界，共黨國家為第二世界，一般新興國家為第三世界，低度開發國家為第四世界，^②有些學者則將開發中國家統稱為第三世界。

在進一步分析中共對外關係時，本文將以中共對國家的分類為主，將中共以外的國家分為已開發國家、共黨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等三個大類進行分析，已開發國家係指美國、西歐、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共黨國家則指由共產黨或原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包括俄羅斯、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原東歐共黨國家、北韓、外蒙古、越南及古巴等國家；第三世界則是指前述國家以外的其他國家，主要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開發中國家。

將中共外交政策實踐面的對象劃分為前述三大類作為分析、觀察範疇，主要是因為已開發國家係中共指稱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中共當年高舉革命大旗、建立政權時所要撻伐的對象，這類國家是中共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國，且在經濟的發展上領先其他國家，在分析意識形態與經濟因素的互動變化上頗具意義；共黨國家（含原共黨國家）是中共意識形態上的「盟友」，雖然此關係早在中共「一邊倒」外交政策結束後便不再堅定，且這些國家多在一九八九年以來的民主化浪潮中相繼非共化，但這類國家對於檢證意識形態認同與經濟互動的變異時也提供了相互對照的一個重要對象；第三世界國家是中共長期爭取的對象，中共也一再自稱自己是第三世界國家，這些國家多數未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且經濟發展多較落後，在相互對照及印證中共向來強調的與第三世界合作是中共外交立足點的說法上，也是一組極具意義的國家。美國是當今世界的超級強權，俄羅斯曾是超強，現今也仍是世界的重要強權，中共與兩大強國的關係值得特別抽繹出來加以分析。

至於分析的樣本方面，則將以中共高層領導訪問國家數目為計算標準，為了使樣本數不會過小，使統計誤差過大，同時避免樣本數過大，使統計失去政治意義，所謂高層領導將以中共黨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及以上層級、國務院國務委員及以上層級（外交部長若未出任國務委員以上職務亦列入計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及以上層級、國家主席副主席等成員，作為分析的樣本。這些人員多數是掌握中共外交決策的重要成員，若非重要決策成員，則以其象徵性的崇高地位，^③在強調象徵性儀節的外

註① 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問題」，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六〇〇。

註② 林碧炤，論國際政治的持續與轉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六年），頁一一三。

註③ 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多不具決策實權，不過，在中共歷史中曾具有所謂「集體領導國家元首」的地位，中共「八二憲法」之前的「七八憲法」未設國家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更具有國家元首象徵地位，副委員長僅就象徵意義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參閱張鑫，「國家元首制之發展」，見翁松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續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二〇六～二〇八。

交活動中，對於觀察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也具有指標意義。

依據前述的分析架構，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高層領導人出國訪問的統計結果如表一。

表一 1979年以來中共高層領導人訪問國家次數統計分析

	出訪國 總數	美國		俄羅斯 (前蘇聯)		已開發國家 (含美國)		共黨國家 (含原共黨國)		第三世界國家	
		次數	百分比 (%)	次數	百分比 (%)	次數	百分比 (%)	次數	百分比 (%)	次數	百分比 (%)
1979	27	2	7.4	0	0	14	51.9	4	14.9	9	33.3
1980	47	2	4.3	0	0	16	34.0	5	10.6	26	55.3
1981	38	2	5.3	0	0	13	34.2	2	5.3	23	60.5
1982	32	0	0	1	3.1	8	25.0	5	15.6	19	59.4
1983	52	2	3.8	0	0	19	36.5	5	9.6	28	53.9
1984	74	2	2.7	1	1.4	22	29.7	17	23.0	35	47.3
1985	95	3	3.1	2	2.1	24	25.2	22	23.2	49	51.6
1986	76	1	1.3	0	0	28	36.9	15	19.7	33	43.4
1987	55	2	3.6	1	1.8	19	34.6	12	21.8	24	43.6
1988	45	2	4.4	1	2.2	17	37.8	11	24.4	17	37.8
1989	52	1	1.92	1	1.92	8	15.4	9	17.3	35	67.3
1990	53	1	1.9	2	3.8	3	5.7	5	9.4	45	84.9
1991	66	0	0	1	1.5	20	30.3	13	19.7	33	50
1992	92	1	1.1	1	1.1	36	39.1	12	13.0	44	47.9
1993	80	1	1.3	1	1.3	17	21.2	16	20.0	47	58.8
1994	89	3	3.4	1	1.1	31	34.8	14	15.7	44	49.5
1995	115	1	0.9	1	0.9	30	26.1	24	20.9	61	53.0
1996	138	2	1.4	4	2.9	30	21.7	29	21.0	79	57.2

註：本表係作者依據統計資料來源統計整理。

統計資料來源：1. 匪情年報，二十一卷七~十二期、二十二卷一~十二期、二十三卷一~六期。

2. 中國年鑑1981~1984、1987~1992。

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ear Book 1985~1986。

4. 中國外交概覽1993~1995；中國外交1996。

5. 中共研究，三十卷一~十二期，三十一卷一期。

從表一的統計結果可以得到以下幾點重要發現與論證：

(一)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連續三年的時間，中共並無高層領導人員赴前蘇聯訪問，至一九八二年以後才有高層官員訪蘇；高層領導赴俄羅斯或前蘇聯訪問的次數每年多為一次或零次，只有一九八五及一九九〇年有兩次高層訪問。

此結果顯示，在一條線反霸統一戰線的外交政策指導下，以及蘇聯出兵阿富汗等事件衝擊下，中蘇共關係的惡化使得一九八二年中共提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之前，中共與蘇聯的政治關係顯得並不密切，再檢視此期間中共每年有兩次高層人員赴美訪問，以及赴已開發國家訪問次數均占對外訪問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共確實與美國及已開發國家維持頗密切的政治互動，且其中，一九七九年中共實際領導人鄧小平的訪問美國，更顯示中共與美建交後雙方表現出的友好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表明要採取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之後，是年十

一月蘇聯領導人總書記布里滋涅夫（Leonid I. Brezhnev）去世，中共派出時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黃華率代表團參加葬禮，中蘇共外交部長二十多年來第一次接觸；一九八四年二月，接任布里滋涅夫總書記職位的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去世，中共派出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率團參加葬禮；一九八五年三月，接任蘇共總書記不久的契爾年柯（Konstantin Chernenko）又過世，中共再派國務院副總理李鵬率團參加葬禮，蘇聯領導人的相繼於任內亡故，製造中蘇共高層接觸的機會，雙方發展了「葬禮外交」，^②三次葬禮外交揭開了中共高層一九八〇年代與蘇聯交往的序幕，雖然一九八四年萬里赴蘇聯時未獲得蘇聯相對的重視，而引起中共對蘇聯的抨擊，^③不過，雙方得以展開高層對話，在「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下，中共顯然已較積極地發展與蘇聯的政治關係。

此外，一九九〇年是中共高層出訪蘇聯最多次的一年，當年四月，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訪問蘇聯，是一九六四年以來，中共總理首次赴蘇聯訪問，同年七月，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沖也赴蘇聯訪問。兩次的高層訪蘇聯，固然是中共與蘇聯長期走向關係正常化發展的結果，但似也顯示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在求擺脫已開發國家制裁時，也有意與蘇聯發展較密切的關係。

(二)除一九八二及一九九一年以外，中共每年均有高層官員赴美訪問。

一九七九年中共與美國建交以來，中共與美國維持一定的高層互動，一九八二年中共雖無高層官員訪美，不過，當年五月美國副總統布希（George Bush）訪問中國大陸，八月雙方簽署「八一七公報」，暫時解決了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以來有關軍售臺灣問題的爭議，^④中共與美國仍維持密切的政治互動關係。

一九九一年中共無高層官員訪美，基本上是由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共發動經濟制裁，並譴責有關大陸人權問題後，雙方關係陷入低潮期的延續。事實上，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共與美國關係陷入低潮，政治互動關係基本停頓，直到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底，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應邀訪美，雙方高層得以會面溝通；^⑤一九九一年，中共雖無高層官員訪美，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卻於是年十一月訪問大陸，天安門事件以來，美國高層官員首次赴大陸訪問，雙方長期不友好的關係又朝向緩和方向發展。

總體來看，延續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政治互動，中共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美國仍採發展友好關係的策略，即使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美國對中共發動制裁與譴責，影響雙邊的互動，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除了在

註② 石志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一九四九·十～一九八九·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六二。

註③ 參閱蘇起，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一年），頁五八。

註④ 參閱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二三六～二四〇。

註⑤ 中國年鑑一九九一（北京：中國年鑑社，一九九一年），頁二七四。

文件及口頭宣示上表達過較強烈的反應，要求美國等其他國家勿干涉內政外，在行動上並未作出太大的反制行動，不但堅稱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不變，默許天安門事件的「重要叛亂份子」方勵之夫婦赴美，更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發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對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提出辯護與說明，^⑤因應美國「干涉內政」的强大壓力，中共並未採積極對抗的政策，反而多所忍讓。

(三)中共高層領導赴第三世界國家訪問的比例很高，均占出訪國數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有超過十年的時間所占比例達五成以上，其中一九九〇年更高達八四·九%。

中共高層領導出訪國家中，第三世界國家的比例相當高，此與中共外交政策宣示中所表示的「第三世界是中共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點」的說法顯然頗為吻合，再證以中共邦交國中第三世界國家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比例來看（見表二），第三世界國家確實是中共外交工作中重要的一環。

表二 中共在各地區邦交國比例

總數	已開發國家		（原）共黨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數目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160	27	16.9	30	18.8	103	64.3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1996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七二六～七三六。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世界國家數目在國際社會原本便較多，如果參照中共邦交國第三世界國家所占比例來看，一九七九年以來，只有一九八九與一九九〇兩年，中共高層領導人出訪國數所占的比例超過其建交國的比例，經此交叉比較分析，第三世界確係中共外交工作的「立足點」，但中共在政治關係的經營上仍以穩固為主，只有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已開發國家對中共發動制裁，中共高層出訪第三世界國家的比例大增，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動交往，以確保當時不利於中共的國際情勢中，中共與國際間的政治互動不致大幅減少，穩定中共的國際地位。

第三世界國家是中共國際政治互動中的一股重要勢力，不過，在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提出後，中共出訪第三世界國家的比例則走向下坡，一九八八年的比例更與已開發國家相等，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使中共進一步認知第三世界在其國際活動中的重要性，在已開發國家的撻伐聲中，第三世界國家的「友誼」使中共更加確定其係第三世界國家的屬性，此後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訪問比例也較穩定地維持在近五〇%以上。

(四)中共高層赴已開發國家訪問的比例多在二〇%以上，不過一九八九年及一九九〇兩年則分別降至一五·四%及五·七%。

從統計資料來看，已開發國家顯然是鄧小平時期中共高層出訪的一個重要的面向

註⑤ 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日，版一。

，一九七九年中共高層出訪已開發國家的比例更高達五一·九%，體現出中共改革開放政策新提出後，與反霸統一戰線外交政策的相配合下，已開發國家在中共外交活動重要性的大增；一九八二年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提出後，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前，除一九八五年外，中共出訪已開發國家的比例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與已開發國家相對占中共邦交國比例未達百分之二十而言，這樣的比例顯然說明，中共對發展與已開發國家的關係顯然是相當積極的。

一九八九、一九九〇兩年中共出訪已開發國家的次數大幅下降，主要是受到已開發國家對中共的制裁，面對已開發國家的制裁，中共對西方國家的反應並非採強烈的對抗政策，而是採取低姿態的和緩政策，要求改善關係。一九八九年十月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時，鄧小平便要求尼克森向美國總統布希表達美國應採取主動行動改善雙方關係；^②同年十二月初，鄧小平接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訪問團，在抨擊已開發國家制裁行動的同時，還強調要加強發展中共與日本的關係；^③同月十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特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時（Brent Scowcroft）也強調要儘快改善中共與美國的關係。^④

值得注意的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已開發國家均停止與中共的高層互訪，當年中共與已開發國家的高層政治互動均係於事件發生前，整個一九九〇年，也只有三次出訪已開發國家，其中首開中共高層「破冰」之旅的國家是日本，一九九〇年六月，中共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出訪日本，第二次是同年十一月，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參加日本平成天皇的即位大典，第三次則是十二月，外交部長錢其琛的出訪美國。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的中共對外關係發展中，除了第三世界的支持使中共不覺孤立之外，日本似乎是中共發展對外關係，突破已開發國家「制裁」的另一股「支持力量」。事實上，從中共歷年高層出訪的資料來看，日本也一直是中共高層出訪的一個主要國家。

(五) 中共高層赴（原）共黨國家訪問的比例均未達二五%，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及一九九〇等三年更降到一〇%以下。

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與共黨國家的高層互動並不特別密切，雖然雙方均高舉馬列主義，但是，意識形態的接近並未能拉近雙方之間的互動，與一九五〇年代中共與共黨國家的密切往來相較，鄧小平時期中共的外交活動中，便如中共的政策宣示，是不以意識形態及社會制度來決定友好關係，統計資料充分顯示中共對共黨國家的態度。

雖然中共反霸統一戰線的對象是蘇聯，但在鄧小平時期初期，中共與其他共黨國家的互動仍不密切，一九八二年中共宣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後，中共與共黨國家的互動也不密切，要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以後，才增多與共黨國家的互動。

註② 鄧小平，「結束嚴峻的中美關係要由美國採取主動」，見鄧小平，前揭書，頁三三一～三三二。

註③ 鄧小平，「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見鄧小平，前揭書，頁三四八～三四九。

註④ 鄧小平，「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才行」，見鄧小平，前揭書，頁三五〇～三五二。

一九九〇年受到六四天安門事件與東歐共黨國家民主化風潮的影響，中共與共黨國家的互動偏低，當年中共與共黨國家的五次高層訪問中，有兩次是與蘇聯，三次是與北韓，^⑩與蘇聯的互動已如前述。而與北韓的密切互動則顯示中共與北韓之間的密切關係，一九九〇年三月，中共新任總書記江澤民訪問北韓，這是江澤民就任總書記以來的第一次出訪，凸顯了中共與北韓的政治關係，就整個長期中共高層出訪共黨國家來看，北韓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國家，顯示北韓確是中共對外活動中一個重要友邦，是共黨國家中關係最密切的一個國家。

一九九〇年東歐共黨政權紛紛解體後，中共高層與這些原共黨國家的互動，總體來看，比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前的互動較少，與中共和共黨國家邦交數的比例相比較，中共與原共黨國家的互動並不多，就統計上的數字而言，共黨國家顯然不是中共高層出訪的重要地區。

二、使領館的設置

邦交國象徵一個國家對外政治關係的發展，對檢證一個國家對外政治互動有重要意義；領事事務包括對僑民的保護、旅居海外國人的服務、護照、簽證及驗證等工作，是正式外交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也把領事事務當成促進雙邊交往、增進人民友誼、發展經貿、科技等方面關係的一環，^⑪領事館的設立，象徵著與該國的民間互動往來的重要性。

從中共邦交國的統計數字顯示，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邦交國中第三世界國家占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二，在蘇聯東歐共黨政權垮台前，已開發國家居第二位，共黨國家居第三位，一九九〇年以後，原共黨分裂為數個國家，中共與原共黨國家的邦交數則居第二位。

不過，經過中共在全球各地設置的領事館交叉分析後，可以發現，中共在已開發國家設置領事館的比例最高，與已開發國家占中共邦交國比例相較，中共在已開發國家設置領事館的比例幾乎是邦交國比例的三倍。從表三的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已開發國家是中共領務工作的重點，中共在第三世界國家設置領事館的比例達四成，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民間互動亦頗多，至於共黨國家的領事館設置比例最低，且低於邦交國比例數。此統計數據證明，中共與已開發國家的民間互動最為密切，與第三世界國家民間互動也高，與共黨國家的民間互動最低。

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宣示後，中共在第三世界設置領事館的比例漸次增加，拉近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似顯示中共確實有意加強與第三世界關係。與前述政治、經濟層面相較，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宣示後，總體而言，中共確係逐步強化對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與民間關係，促進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

註⑩ 中國年鑑一九九一，頁二九三～二九四。

註⑪ 田曾佩主編，前揭書，頁六〇〇。



表三 中共在不同國家地區設立領事館數額與比例

		總數	已開發國家		(原)共黨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數目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1979	邦交國	121	26	21.5	13	10.7	82	67.8
	領事館	10	6	60.0	1	10.0	3	30.0
1982	邦交國	125	26	20.8	13	10.4	86	68.8
	領事館	12	8	66.7	1	8.3	3	25.0
1995	邦交國	160	27	16.9	30	18.8	103	64.3
	領事館	55	25	45.5	7	12.7	23	41.8

資料來源：中國外交概覽1987；中國外交1996年版。

三、條約的締結

條約的締結象徵著國與國之間有積極的往來，需要透過法律的形式加以規範，在檢證一個國家對外政策與關係發展時亦具指標作用，條約締結數字的多寡，可說明國家之間的具體互動情形。

表四 1979年以來中共與各國家、地區締結重要條約統計表

	締約總數	美國	俄羅斯 (前蘇聯)	已開發國家 (含美國)	(原)共黨國家 (含俄羅斯)	第三世界 國家	國際組織
1979	111	14	1	49	20	42	0
1980	126	9	2	42	31	51	2
1981	71	2	1	21	17	30	2
1982	137	6	2	38	29	63	7
1983	83	3	0	18	15	47	3
1984	93	6	3	28	25	38	2
1985	141	2	6	46	44	50	1
1986	89	0	1	21	20	36	12
1987	121	2	4	22	37	46	16
1988	140	1	7	22	25	78	15
1989	135	0	1	6	37	70	22
1990	129	0	9	8	25	87	9
1991	147	0	5	17	37	70	23
1992	207	1	12	10	102	77	18
1993	179	2	1	10	64	85	20
1994	222	2	14	16	85	88	33
1995	202	0	2	13	61	95	33

資料來源：1. 中國年鑑 1981~1984、1987。

2. 中國外交概覽1988~1995。

3. 中國外交1996年版。

4. 中共年報1980~1981。

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ear Book 1985~1986。

從表四的統計來看，中共與各國家地區締結重要條約的情形來看，其結果與前述政治經濟互動有較明顯的不同，中共在對外締約方面表現出與共黨國家或原共黨國家較為密切的關係，比雙方的政治出訪及經貿互動較多，當然一九九二年以後對共黨國家締約的數目大幅提升與共黨國家解體後，雙方必須重新締結重要條約有關，不過，即使在此之前，雙方締結條約的比例也頗高，顯示出在官方實質的條約規範互動上，中共與共黨國家仍維持相當高的互動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在蘇聯東歐共黨國家尚未垮台前，中共與共黨國家間簽訂特有的「交換貨物與付款協定」，此類條約及科技文化交流方面的條約，是中共與共黨國家之間的條約互動情況頗高的重要原因。

由前述統計結果似可說明，中共在推動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時，政治與經貿互動仍以已開發國家與第三世界為主，不過，在從中共與各國官式締約互動中，中共與各類國家的互動顯得較為平均，而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也較為凸顯。

至於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締約的情形雖頗多，不過，其中有許多都是對第三世界的貸款與派遣醫療隊；[◎]而中共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締約情形則比不上與其政經互動關係之密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與國際組織之間簽訂條約日多，但其中多數都是國際組織對中共的貸款，也有許多已開發國家貸款給中共，中共則又貸款給第三世界與共黨國家，形成一個有趣的互動關係，中共一方面是受援國，但同時又扮演著援助國的角色。

肆、經濟層面的分析

一、經貿往來

兩國關係的互動，經貿往來是一項重要的指標，雙方的貿易愈高，顯示彼此之間的經濟互動關係愈密切，中共對外貿易額的統計數字可顯示其對外經濟關係，為了檢證中共對外經濟關係的發展，本節將檢證中共與不同類型國家的經濟關係，論證中共對外經貿關係發展與其外交政策的關聯。

由中共的資料統計，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間，中共與不同國家貿易額比例如表五，此表的統計結果，可得到以下的重要發現與論證：

(一)中共與美國的貿易額維持穩定發展，雙方每年貿易額幾乎占中共對外貿易額一成左右。

一九七九年中共與美國建交以來，雙方貿易額維持穩定成長，多數時間均維持在

註◎ 以一九九五年為例，當年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締結的九十五項條約中，有二十三項是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十八項是派遣醫療隊至第三世界國家，十三項是帶有援外性質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此三類條約共五十四項，約占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締約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一九九六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二六八～二八七。

表五 中共與不同國家貿易額比例

單位：億美元

	外貿 總額	美國		俄羅斯 (前蘇聯)		已開發國家 (含美國)		共黨國家 (含原共黨國)		第三世界國家 (不含臺港澳)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1979	293.33	24.52	8.36	4.93	1.68	175.26	59.75	34.68	11.82	45.77	15.63
1980	378.22	48.13	12.73	4.92	1.30	225.20	59.54	38.69	10.23	62.59	16.53
1981	403.75	58.88	14.58	2.25	0.56	243.83	60.39	25.20	6.24	70.01	17.37
1982	392.97	53.36	13.58	2.76	0.70	221.32	56.30	27.97	7.10	75.78	19.30
1983	407.27	40.24	9.88	6.74	1.65	223.6	54.90	30.22	7.40	75.86	18.60
1984	497.72	59.63	11.98	11.83	2.38	279.29	56.10	36.55	7.30	79.17	15.90
1985	602.46	70.25	11.66	18.81	3.12	349.09	57.94	49.74	8.26	86.91	14.42
1986	600.97	59.94	9.97	2.64	0.44	326.48	54.33	67.17	11.18	88.37	14.79
1987	681.10	67.72	9.94	2.30	0.34	341.06	50.07	62.83	9.22	92.39	13.56
1988	804.90	82.62	10.26	29.02	3.61	382.78	47.56	73.95	9.19	106.14	13.18
1989	825.83	99.89	12.10	36.77	4.45	395.81	47.93	78.75	9.50	103.79	12.52
1990	1154.4	117.68	10.19	43.79	3.79	482.25	41.77	73.96	6.41	156.72	13.62
1991	1356.3	141.66	10.44	39.04	2.88	562.67	41.49	59.56	4.39	188.79	13.92
1992	1655.3	174.95	10.57	58.62	3.54	680.04	41.08	90.43	5.46	231.84	13.96
1993	1957.1	276.52	14.13	76.80	3.92	1022.10	52.22	126.24	6.45	333.19	16.94
1994	2367.3	354.32	14.97	50.77	2.14	1266.63	53.50	97.85	4.13	413.06	17.45
1995	2808.5	408.30	14.54	54.63	1.95	1494.75	53.22	107.39	3.82	622.50	22.16

註：本表係依作者統計資料來源整理。

資料來源：中共對外經濟貿易年鑑，1984~1996/97。

一成以上，顯示中共與美國的經濟關係發展頗為密切，一九八二年中共宣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以後，中共與美國的貿易額占中共對外貿易的比例雖有下降，但下降幅度並不大，仍占中共對外貿易額比例的一成左右。雙方的貿易金額雖有起落，但總體趨勢基本上是呈穩定的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美國等西方國家雖對中共進行經濟制裁，但是，從統計的資料顯示，中共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雙方貿易額比例下降幅度只有兩個百分點，雖然有下降的情形，但是下降幅度只是回到一九八八年的水平，甚至高過一九八七年；而且，一九九三年雙方恢復較正常的經貿關係之後，中共與美國的貿易額有所成長，成長幅度近四個百分點，顯示雙方的經貿關係不但恢復，且逐步加溫中。

前述的統計結果似乎顯示，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或許對中共與美國政治關係產生影響，但對雙方的經濟關係影響並不太大，中共獨立自主對外政策在此事件中表現非常突出，政治文件宣示的反應較激烈，但實際上的對外關係運作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中共仍持續發展與美國的經貿關係。

(二)中共與俄羅斯或前蘇聯的貿易額很小，均低於中共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五。

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與蘇聯經貿關係一直維持低調發展，一九八二年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宣布前，雙方的貿易額不到中共對外貿易額的百分之二，金額不超過五億美元，數量非常小，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及一九八六、一九八七等四年的貿易額甚至不到三億美元，占中共對外貿易比例不到一個百分點。此結果顯示，中蘇共之間經濟關係相當不密切，在雙方政治關係不良時，已是如此，中共在走向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以後，對蘇聯政治關係雖有逐步發展與改善，但是，雙方的經貿關係顯然並未隨之發展，雖然一九八九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訪問中國大陸，雙方政治關係發展順利，但雙方的經貿關係仍然未隨之而有大幅改善。

在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以後，追求國家經濟發展是中共一項最主要的中心任務，開展對外貿易則是達成這項任務的一個重要面向，然而，中共與蘇聯之間的經貿關係卻相當不發達，中共所謂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對外經貿關係方面表現出來的，仍然是一種偏重美國的形勢，在追求經濟成長的過程中，蘇聯並非中共重要的經貿伙伴，此與一九五〇年代中共與蘇聯貿易額均占中共外貿百分之三十以上，甚至多年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情形相比，^③中共對外經貿關係中，蘇聯的重要性便顯得非常低，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並未明顯影響其與美國及蘇聯的經貿關係。

(三)已開發國家是中共對外貿易最主要對象，除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外，其餘時間均占中共對外貿易額的一半以上。

一九七九年以來，已開發國家是中共對外經濟關係最重要的對象，特別是在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初期，中共對已開發國家的貿易額占對外貿易額約六成，一九八二年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宣示以來，中共對已開發國家的貿易占中共外貿總額的比例雖有下降，但幅度並不大，且仍維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兩年，中共對已開發國家貿易額雖有下降，但比例仍接近百分之五十。

一九九〇年以後連續三年，中共對已開發國家貿易占中共對外貿易的比例有明顯下降的趨勢，此顯然與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有密切關係。不過，從中共對外貿易主要國家地區來看（見表六），中共對已開發國家外貿比例下降的六個百分點中，對日本貿易比例的下降幅度最大。日本顯係中共對外經貿關係最主要國家，無怪乎鄧小平一九八九年十月初接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時，要直稱他們是「真正友誼的表現」、「患難見真情」。^④

總體而言，六四天安門事件雖使中共與已開發國家貿易額比例下降三年，但一九九三年之後便又回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共面對已開發國家的制裁行爲，雖然在口頭上稱其爲「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但此種政治宣示上的效應並未反應在經貿關係上，面對經濟制裁的壓力，中共顯然採取相對低調的處理，所謂獨立自主外交政

註③ 參閱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要素研究：一邊倒政策時期的論證與評估」，東亞季刊，第二十七卷第三期（民國八十四年冬季），頁二二。

註④ 鄧小平，「結束嚴峻的中美關係要由美國採取主動」，鄧小平，前揭書，頁三三一～三三二。

表六 中共與主要國家地區貿易額與比例分析

單位：億美元

	貿易總額	美國		日本		港澳		臺灣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1979	293.33	24.52	8.4	67.08	22.9	37.62	12.8	NA	-
1980	378.22	48.13	12.7	92.01	24.3	51.74	13.7	NA	-
1981	403.75	58.88	14.9	99.78	24.7	64.71	16.0	NA	-
1982	392.97	53.36	13.6	87.61	22.3	63.60	16.2	NA	-
1983	407.27	40.24	9.9	90.77	22.3	69.84	17.1	NA	-
1984	497.72	59.63	12.0	127.28	25.6	92.22	18.5	NA	-
1985	602.46	70.25	11.7	164.34	27.3	112.00	18.6	NA	-
1986	600.97	59.94	10.0	138.64	23.1	118.59	19.7	NA	-
1987	681.10	67.72	9.9	131.60	19.3	170.97	25.1	NA	-
1988	804.90	82.62	10.3	146.63	18.2	226.09	28.1	NA	-
1989	825.83	99.89	12.1	146.63	17.8	227.48	27.6	NA	-
1990	1154.4	117.68	10.2	165.99	14.4	415.72	36.0	25.75	2.2
1991	1356.3	141.66	10.4	202.51	14.9	502.98	37.1	42.33	3.1
1992	1655.3	174.95	10.6	253.81	15.3	587.40	35.5	65.59	4.0
1993	1957.1	276.52	14.1	390.63	20.0	331.84	17.0	143.94	7.4
1994	2367.3	354.32	15.0	478.94	20.2	426.20	18.0	163.27	6.9
1995	2808.5	408.3	14.5	574.67	20.5	404.97	14.4	178.82	6.4

註：本表係作者依據統計資料來源分類統計。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1984~1996/97。

策，在此時顯示的，是中共「委屈求全」只求維持與已開發國家的經貿往來，顯見已開發國家是中共對外經濟關係最密切的地區。

(四)中共與原共黨國家的貿易額不大，多數時間都低於中共對外貿易額的百分之十以下。

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與共黨國家或原共黨國家的經貿關係並不密切，只有在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初期的一九七九與一九八〇年，以及一九八六年等三個年度曾超過中共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十。顯示中共大力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發展經濟的策略中，共黨國家的重要性並不高，與前節中共與共黨或原共黨國家的政治互動關係來看，中共與共黨國家的經貿關係遠遠比不上政治關係，中共與共黨或原共黨國家的高層政治互動已不是很重要，經貿關係的互動更差，顯見中共對外關係中，共黨國家的重要性很低。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及一九九〇年東歐共黨政權垮台的風潮之後，中共與共黨及原共黨國家的貿易額，更占中共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七以下，這樣的結果顯示，與中共具有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高度「同質性」的共黨國家，在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下，仍然無足輕重，不是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下積極發展對外經貿關係的對象。

(五)第三世界國家似乎不是中共對外貿易的一個重要地區，除了一九九五年以外，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貿易額占中共對外貿易總額均不到百分之二十。

從表五的統計來看，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地區的貿易額，多數時間均不足中共對外貿易的二成，與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關係來看，中共與第三世界的經貿關係似乎比不上政治關係密切，即如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貿關係並未如政治互動一般，發生明顯而重大的變化。中共所宣稱的第三世界是中共對外關係「立足點」的說法，似乎在政治層面的意義要遠大於經濟層面的意義。

這樣的統計分析結果指出，中共實際上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額並不大，與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邦交數，及前述中共與第三世界的高層互動相較，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貿關係是相對較不密切的，中共與龐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間的經貿互動不如政治互動密切，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貿互動仍處於待發展的階段。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一九九三年開始，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額開始增加，到一九九五年已超過中共對外貿易額的百分之二十，就中共對外經貿關係而言，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貿關係似有逐步穩定成長的趨勢。

(六)中共對美國、日本、香港及澳門等三個國家、地區的貿易額，便幾乎占去中共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從表六的統計可見，日本、美國及港澳地區是中共對外貿易最重要的三個國家、地區，除了一九七九年及一九八三年三地合占中共對外貿易四四·一%與四九·三%外，其他時間，三地均合占中共對外貿易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見，日本、美國及港澳地區可說是中共對外經濟關係最主要的三個國家、地區，在中共對外經貿關係發展中，他們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中共對已開發國家的龐大貿易額，日本與美國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影響下，影響中共對外貿易頗大的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二年間，這三個地區貿易額更超過中共對外貿易額的六〇%，形構了中共對外貿易的主要部分，此似乎顯示，中共宣示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對外經貿方面似乎集中於幾個重要國家、地區，而不如高層政治互動般，較分散於各個地區的國家。一九九四年的資料顯示，日本、美國、港澳及臺灣等地與中共的貿易額，便超過中共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六十，若再計入歐洲共同體的貿易額，中共絕大多數的對外貿易便集中在此五大地區。

如果再進一步分析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後中共對外經貿發展，從表五與表六的交叉分析相較，中共受到已開發國家經濟制裁影響而減少的雙方貿易比例，似乎多數是由中共對港澳地區的貿易所補足，港澳地區成爲實際上中共對外貿易的一個主要支撐點，如果說，第三世界國家在中共對外政治發展受挫時，扮演支援者的角色，那麼，港澳地區顯然是中共對外經貿受挫時，扮演支援者的角色。港澳地區在中共發展對外經貿關係上確有重要地位，成爲中共對外開放發展經濟貿易的一個重要轉運站與突破點。

此外，從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共對港澳地區的貿易發展來看，中共對港澳地區的貿易額似乎在完成突破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制裁後，便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共對港澳地區的貿易額與貿易比例都大幅下降，而中共與臺灣的貿易則呈穩定發展的趨勢。

二、援外活動

「對外援助」(foreign aid) 是已開發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互動的重要形式，贈與國透過金錢、貨物或技術的轉移給受贈國，受贈國得到經濟上的利益，贈與國也希望透過這種援助行動以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⑤從一個國家對外援助的國家數與金額，可看出該國與其他國家的互動情形。中共對外援助的主要形式包括：政府貼息優惠貸款、援外項目合資合作及無償援助等，^⑥此外，派遣醫療隊赴各國助診，也可顯示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援助的情形，透過中共對外援助金額、援助國數及醫療隊派駐國數的分析，有助於瞭解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動。

表七 中共對外援助情況分析

	經濟援助金額 (百萬美元)	經濟援助國數	醫療隊派往國數
1979	275.9	4	29
1980	198.3	7	29
1981	41.8	7	32
1982	80.1	10	33
1983	114.4	28	35
1984	467.3	32	38
1985	248.6	35	42
1986	303.6	26	42
1987	272.0	25	42
1988	60.4	13	42
1989	323.5	24	42
1990	374.6	43	41
1991	302.9	36	37
1992	345.0	44	37
1993	*	40	37
1994	*	64	37
1995	351.6	72	39

* 欠缺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1. 林德昌，「一九九〇年前後中共的援外政策——持續與變遷」，*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八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頁四〇。

2.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1986~1996/97。

3. *中國外交*1996年版。

註⑤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4th ed. (Englewoo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3), p. 226.

註⑥ 張熾鑫，「援外工作在改革中發展」，見*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一九九六/九七*（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七二~七三。

由表七分析結果可知，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動中，經濟援助是一個重要的部分，中共一九七九年以來，仍以大量的無息貸款與無償援助來支助第三世界國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外經濟援助的國家並非只限於第三世界，共黨國家也是中共對外援助的重要對象。^②不過，總體來看，第三世界仍是中共對外援助的最主要對象。

與前述政治經濟層面分析相較，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往來顯然是以高層政治互動與經濟援助為主，這樣的互動情形來看，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係採高層訪問與經濟援助的方式來增進雙方之間的關係，一九八八年中共外援金額與國家均減少，一九八九年後又大幅增加，顯示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大幅增進的政治互動，與經濟援助有密切的關係。

伍、軍事層面的分析

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與外國的政治、經濟議題衝突中，基本上是採取和平談判方式解決，採用軍事行動手段解決衝突，主要是一九七九年二月發動的所謂「懲越戰爭」，中共強調在反對越南挑起領土爭端、迫害華僑、侵略柬埔寨等前提下，以越南侵犯邊境進行自衛還擊為由，與越南展開為期一個月的「中越戰爭」；^③鄧小平時期另一次與外國發生軍事衝突對象也是越南，主要是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四日在南沙群島海域，與越南海軍發生二十八分鐘的海戰。^④除了前述兩次較大型的武力衝突外，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中共與越南的陸地邊界仍不時出現武力衝突。

這些武裝衝突都涉及領土主權問題，一九七九年的「懲越戰爭」基本上是在「反霸統一戰線」外交政策下，發動有計畫的戰爭，越南被中共定性為「小霸」，而加以「懲罰」，軍事行動與外交政策並無太大矛盾；第二次的海戰則發生在中共提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後，不過此次事件嚴格上而言應屬偶發衝突，並非有計畫的戰爭，且戰爭僅歷時二十八分鐘便停止，戰爭並未昇高或擴大，其他較小的武裝衝突並非戰爭而是小型的武裝衝突。^⑤在和平外交政策的方針下，中共也與越南舉行談判，強調要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雙方領土問題。^⑥

除了與越南的武裝衝突外，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與其他國家有關政治及經濟議

註② 例如，一九九四年中共對外正式締約提供貸款或無償援助的十六個國家中，有七國是共黨國家或原共黨國家，一九九五年中共對外正式締約提供貸款或無償援助的二十二個國家中，有三國是共黨國家。參閱，中共年報1995（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一九九五年），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1996年版，頁七六九～七九五。

註③ 參閱韓念龍主編，前揭書，頁二六八～二八七。

註④ 參閱人民日報（北京），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版一。

註⑤ 例如一九八七年中共與越南邊境仍不時出現武裝衝突，一架越南軍機曾被中共擊落，中共則對越南提出抗議，越南也先後兩次提出邊境停火的建議，衝突雖不間斷但均屬小型，且中共與越南雙方仍多次要求進行談判。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主編，中國外交概覽一九八八（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六二～六三。

註⑥ 田曾佩主編，前揭書，頁八一。

題的爭議，都主張以和平談判解決，特別是在曾發生過或有潛在衝突可能的領土主權爭議上，中共均強調擱置主權爭議，在與印度的邊界問題上，與印度展開多次會談，主張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前要保持邊境的和平與安寧；④在釣魚台問題上，中共也表示要擱置主權爭議；⑤在南沙群島問題上，當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先後以武力或立法等方式，宣示擁有南沙群島主權時，中共並未出兵「捍衛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只強調擁有南沙群島主權，一九八〇年代末以來，中共更表示採取「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政策，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⑥就衝突的解決而言，中共時常把軍事行動與外交談判交互使用，⑦作為其外交政策執行的重要方式。

從解決衝突的行動上而言，一九八二年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宣示後，中共基本上便未採取有計畫的軍事行動解決問題，即使面臨最敏感的「領土主權」爭議時，中共也未採行直接軍事行動，就此面向而言，中共確實有意執行其宣稱的「和平」外交政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對領土主權問題上，中共雖未以直接軍事行動宣示其立場，但卻多次採取「軍事演習」方式，例如一九八七年以後，中共多次在南沙群島海域進行軍事演習，一九九六年臺灣舉行總統大選，中共也適時舉行大規模演習，軍事演習似乎成為中共和平外交政策下，另一種強力「捍衛」領土主權的方式。而與越南的武力衝突，在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後仍未間斷，因此，從實踐的層面來看，中共所謂的和平外交政策雖是普遍的目標，但在運作上仍有選擇性，特別是在陸地領土的衝突中，武力「自衛」似仍是中共的主要做法之一。

陸、結 論

從前述政治經濟等層面的實證分析，吾人可以進一步論述，鄧小平時期中共外交政策宣示與實際行動之間的關係。

一、一九八二年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宣示前

一九八二年中共宣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前，中共與美蘇等超級大國、已開發國家、共黨國家及第三世界的政經往來與政策的互動關係可整理分析如下：

(一)中共與美國維持較密切的政治關係，與美國的經濟互動也朝正面發展，對蘇聯的政治關係則顯得相當疏遠，與蘇聯的經濟互動則相當低潮。

(二)前述的政經互動效果，反應在與美國關係較密切的已開發國家，以及與蘇聯關係較密切的共黨國家，中共與已開發國家保持較良好的政治互動，也發展並維持高額

註④ 同前註，頁一〇七。

註⑤ 鄧小平一九八二年訪問日本時便強調要擱置釣魚台問題，日後出現有關「保釣」議題時，中共均仍堅持此立場。

註⑥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編，*中國外交一九九六年版*，頁七。

註⑦ John W. Garv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3), p. 250.

的經貿往來，中共與共黨國家之間的政經關係，不但政治互動較少，且經濟關係也不密切。

(三)政經互動情勢顯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宣示前，中共仍然持續採行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一條線」路線，積極持續改善並發展與美國及西方國家的政經關係，同時這樣的「反蘇霸」布局，政治宣示上明顯指向蘇聯，而實際行動效果上則擴及共黨國家。

(四)中共與第三世界的互動似乎較不受到政策宣示的影響。政策宣示前，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一直維持較好的政治互動，經貿關係則維持平穩而不密切的互動發展。

二、一九八二年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宣示後

一九八二年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宣示後，中共與美國、蘇聯、已開發國家、共黨國家及第三世界的政經往來與政策互動關係可說明如下：

(一)政策宣示後，中共仍持續維持與美國良好的政治互動，但也開始與蘇聯恢復並開展政治上的互動，在政治層面上，中共似已走向不傾向美蘇兩大國任一方的政策，^⑥試圖走向一種較等距的三角政治互動關係；不過，在經濟關係發展上，獨立自主政策的宣示並未對三角經貿關係帶來明顯的大幅轉變，中共對美經貿互動雖然有所減少，但次年便又回升，主要是經濟因素的影響，而非政策的制約，對蘇聯的經濟關係雖有改善，但緩慢而不明顯。

(二)政策宣示後，中共對共黨國家的政治互動雖一度減少，但隨後便開始大幅增加，獨立自主外政策的政治效果，較程度地反應在對共黨國家的政治互動，顯然，這樣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在改善與共黨國家的政治關係上，發揮了較大的效果與影響，至於對已開發國家的政治互動則無明顯影響。

(三)政策宣示後，中共對第三世界的政治互動受到較大的影響，這樣的獨立自主外交，似乎是減少對第三世界的政治互動，而增加對共黨國家的互動，如此轉變似與中共強調的團結第三世界有所出入。

(四)政策的宣示，對中共對外經貿關係並無太大影響。

三、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宣示後

一九八六年中共正式提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此次政策宣示對中共對外政經互動的關係可說明如下：

(一)此政策明顯係對前述獨立自主政策的「正名」宣示，在實際對外關係上，中共仍持續發展與美蘇兩國的政治關係，對其他國家的政治互動也未發生變化，經貿關係也未出現明顯的變化。

註⑥ Robert G. Sutter,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mperatives and China's Third World Policy," in Lillian Craig Harris and Robert L. Worden,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Champion or Challenger* (Massachusetts: Auburn House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 30.

(二)一九八九年以後出現的對美國、已開發國家及共黨國家政治經濟互動的明顯減少，並非受到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主要是受到其他國家的「中國政策」，以及共黨國家內部情勢轉變等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當前述國家政策轉變後，中共與這些國家的政經關係又回到原點，顯示中共政策確實沒有改變。

(三)中共對來自外在環境的壓力，表現出的是一種自制的「防守」政策，刻意壓低其影響，口頭宣示上雖有反擊，但係採守勢，實際作為上也表現出中共求取「和平」穩定環境的作法，使此種「衝突」的情勢沒有升高，終而走向緩和。

本文的研究分析發現，中共對外關係實踐面與政策面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中共外交政策宣示上雖具有濃厚的道德色彩，^⑥但事實上也具有高度的實際行動指導性質。而「獨立自主」主要體現的是在政治上走出自己的道路，擺脫與超級強國的結盟或敵對的格局，進一步創造有利於內部經濟發展的條件；「和平」主要是在體現中共追求國際與國內局勢的穩定，以維持中共經濟能在不受戰爭干擾的穩定環境中成長。這樣的論證說明，鄧小平時期中共的外交政策似乎是在為鄧小平所主張的經濟建設發展而服務，鄧小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所提的反霸、統一、現代化等三項任務中，^⑦現代化建設確實具有核心地位，且進一步制約著整個中共外交政策發展。形構了一種為經濟發展而服務的「有鄧小平特色」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中共對外活動均在外交政策的宣示下運作，在對外關係發展上，當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提出後，中共在經貿活動上雖未能與（原）共黨國家發展較密切關係，但在政治活動上已展示較高的企圖心，證諸在彼此的條約規範上，中共仍與（原）共黨發展多層次的互動關係。

在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動上，也表現出同樣的情況，中共透過高層出訪以及經濟援助來提高雙方的互動關係，同時，也不斷增加雙方的經貿互動，在有關於爭端議題上也儘量採取克制方式，表現出其「維護世界和平」及「第三世界利益維護者」的形象，從實證的分析上，均可看出中共外交活動上所作的調整。

在對已開發國家的互動上，中共與其發展密切的經貿關係，與此同時，中共與已開發國家間的政治互動則隨著外在形勢的發展而有所調整，在與已開發國家發展密切關係的同時，展現出「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利用已開發國家的資金及雙方的經貿互動發展內部經濟，但在政治面上仍不放棄對已開發國家的批判，政治、經濟層面的分別對待，顯示出一種全新的「獨立自主」面貌。

總體來看，在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下，中共利用其龐大的國內市場、逐漸強大的國力與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際政治地位，在國際活動上逐步發展其所宣示的「獨立自主」政策，透過這樣的外交政策，進一步促進大陸內部經

註⑥ Wang Jis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4), p. 493.

註⑦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與任務」，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二九二。

濟發展，一方面鞏固中共政權統治，另一方面則可藉由國力的提升保障中國大陸的領土主權完整，同時透過國力的提升，提高中共的國際地位，發揮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進而形塑一個最適合中共政權持續統治的國內外環境。

本文的論證主要是從中共外交政策實踐的角度推論，在邏輯的推論過程中，難以完全顧及其他國家與現實國際關係情勢對中共對外關係發展的制約；同時，礙於篇幅的限制也未能從中共對外締約的實際情況及與周邊國家關係的發展多所著墨；此外，前述的統計分析所能反映出的只是實際情況，本文只是企圖透過實證資料對中共的外交政策輸出面的政策與行動進行具體的檢證，但礙於篇幅未能就政策的輸入面與決策過程進一步推證其間深層的因果關係，作者希望未來能夠就這個面向再作進一步深入的分析論證。

*

*

*

